

审判 王尔德 实录

孙宜学 编译

6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7-5633-5288-0



9 787563 352883 >



上海贝贝特

ISBN 7-5633-5288-0/K · 295

定价：26.00 元

审判 王尔德 实录

孙宜学 编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判王尔德实录/孙宜学 编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5

ISBN7 - 5633 - 5288 - 0

I. 审… II. 孙… III. 王尔德, O. (1856 - 1900) - 人物研究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511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hpress.cn>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185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6 800 册 定价: 26.0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 序

暴风雨中的百合

王尔德说过：“我的一生有两大关键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进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监狱。”

牛津大学培养了他唯美的人生观、艺术观，他把生活看成是享乐主义和感官主义的欢宴，他把世间所能享受到的快乐，差不多都享受到了，把地球上所有快乐的果子，也都吃到了。

牛津大学8年时光对他的影响终其一生，他在学校获得的一系列成功使他把一个本是对任何一个有思想、对生活抱有美的态度的人都深怀敌意的社会想得太美好、太可以随心所欲了。他希望自己身边一直有鲜花和掌声，一直有崇拜者和同情者。他放浪不羁，才华横溢，妙语连珠。他希望生活一直像在牛津时那样：父亲替他付学费，学校把他与社会隔离，只给他知识与美，而他则可以选择可爱、精美的一切，拒绝一切可厌、病态、粗鲁的生活。他想吃到生活中所有美的果子，他想只走在有阳光的路上。他拥有太多的知识，但却过于粗鲁、自私地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感官快乐方面，他属于那种不想付出劳动就想尝到收获果实的快乐的人。就是这种生活态度，让他后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在自己身边聚拢了一大群与他地位、趣味相当的青年，日夜

宴乐,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因而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指责为同性恋者的领袖,道德败坏者。但王尔德一直认为自己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能使自己免受道德、法律的束缚,因而多次为自己的行为公开辩护,说自己哪怕是同性恋,也是为了追求实现美的方式。王尔德的入狱,是与他同社会、道德的这种对立分不开的;但直接的原因则是与他的俊友——昆斯伯里侯爵的儿子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密切关系。

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相识于1891年,这是一次悲剧性的会面,地点是王尔德在伦敦泰特街的家,介绍人则是两人共同的朋友里奥纳尔·约翰生。

道格拉斯此时才21岁,正在牛津大学读书,对诗歌感兴趣。会面前几个月,他已读过《道林·格雷的画像》,非常崇拜此时在文学圈子里已是争议四起的作者。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并无任何特异之处,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交谈。王尔德的随和与健谈给道格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分手前,王尔德邀请道格拉斯以后一起吃饭,后者答应了。

几天后,两人在阿尔玛特俱乐部第二次见面,王尔德送给道格拉斯一部特制的大开本《道林·格雷的画像》,上面的题词是“阿弗雷德·道格拉斯,朋友,也即本书作者奥斯卡赠,1891年7月”。这次会面之后,王尔德开始被道格拉斯所吸引:后者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外貌俊美,举止迷人,加上又是一位侯爵的儿子,这一切都促使两人的关系加速发展。

从大约1892年5月开始,王尔德对道格拉斯的喜爱变成了迷恋,道格拉斯对王尔德的崇拜也转换成迷恋,两人开始密不可分。王尔德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人,不论食物、衣服、装饰品,他都是买最豪华的,而各种娱乐场所则是他的乐园;道格拉斯也是一位花花公子,两人在一起可谓是志趣相投,珠联璧合。王尔德不停地

邀请道格拉斯与自己一起吃午餐、晚餐,给他写信、写便条、发电报,他也常常送礼物给道格拉斯,还为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

据道格拉斯回忆,自1892至1895年间,他和王尔德光吃饭就用去了5 000英镑,即每星期平均40英镑(当时的1英镑略等于如今的70英镑),每日如吃三餐,则每餐为两英镑,即使与当时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水平相比,这也是极奢侈的了。

昆斯伯里侯爵是位傲慢、脾气暴躁、怪异,或许还有点精神不正常的苏格兰贵族,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发展和推进了业余拳击规则,即所谓的昆斯伯里规则,除此之外并无什么可道之处。道格拉斯与王尔德交往以后,昆斯伯里侯爵刚开始并没在意,甚至还有点儿得意,毕竟王尔德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但慢慢地,他开始认为王尔德在对自己的小儿子施加不好的影响,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叫儿子离开王尔德,回到家里来。这封信的口气还是比较温和的,但道格拉斯回信拒绝了父亲。

1892年年底的一天,王尔德与道格拉斯正在皇家饭店吃饭,发现昆斯伯里正在临桌窥视他们。王尔德要求道格拉斯去请他过来,介绍大家认识,昆斯伯里侯爵虽不情愿,但还是过来了。三人同桌,王尔德依然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可以肯定的是,昆斯伯里侯爵此时也被王尔德的风度和优雅吸引住了,所以谈话延续了很长时间,最后三人还一起抽烟。两天后,昆斯伯里侯爵给儿子写信,说自己收回以前对王尔德的所有评价,他认为王尔德是位迷人、聪明的绅士。

但这种相对友好的友谊并未维持很长时间。1894年初,昆斯伯里侯爵听到了各种关于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的传言,尤其是从律师乔治·列文斯口里听说了王尔德被敲诈之事(这与道格拉斯的粗心有关。他在牛津时把一套旧衣服送给一位穷朋友伍德,后者从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王尔德写给道格拉斯的4封信。他就以返

回其中3封信为条件,敲诈了王尔德,另外两个敲诈者则利用剩下的一封信敲诈了王尔德)。之后,侯爵认为王尔德很可能是位同性恋者,于是就开始写措辞严厉的信,要求儿子终止与王尔德的关系,若不断绝与王尔德的关系,就断绝他的经济来源。在同年4月1日的一封信里,昆斯伯里侯爵威胁儿子:“我不想去分析你们的这种亲密关系,我也不会提起控诉,但在我心里这是一桩不可能再坏的事了。”道格拉斯断然拒绝,在回复电报中反唇相讥:“你是一位多么可笑的小男人!”

接到儿子的电报,昆斯伯里侯爵更加恼羞成怒。4月3日,他在给阿弗雷德·道格拉斯的电报里说:“你这个目空一切的小无赖。如果我再看到你和那个人在一起,我就用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公开侮辱你们!我已经在秘密计划此事了。我喜欢公开的方式,无论如何我不会因允许这种状态继续下去而受到任何指责。除非你们断绝交往,否则我就实施我的威胁计划。”

1894年6月底,昆斯伯里侯爵突然带着一位王尔德并不认识的绅士,实际上是位获过奖的拳击手,不宣而至王尔德在切尔西的住处。王尔德与他们在书房进行了一场谈判。王尔德义正词严,要求昆斯伯里侯爵就信中对自己和妻子的侮辱性言辞道歉,但昆斯伯里侯爵不但再次拒绝,而且还一一列举他所知道的王尔德与道格拉斯在不同场合的“亲密行为”,王尔德斥之为谎言,并威胁说要控诉他。昆斯伯里侯爵提到王尔德曾被敲诈过的写给道格拉斯的信,王尔德坚持认为那是“美丽的信”。昆斯伯里侯爵再次威胁说下次再见到王尔德与道格拉斯在一起,他会“揍扁”两人,而王尔德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昆斯伯里家族的原则,奥斯卡·王尔德的原则是:一见就开枪!”

王尔德赶走前来挑衅的客人,并当着侯爵的面告诉自己的仆人:“这就是昆斯伯里侯爵,伦敦最臭名昭著的恶棍。你以后再也

不许他进我的门!”

昆斯伯里侯爵开始像疯了一样出没于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经常光顾的酒店,放口风说下次若再见到两人在一起就“打烂”他们。道格拉斯采取的应对措施则是:每次要到某个酒店之前,都写信告诉父亲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邀请他来“看看”。如果他采取任何计划中的“行动”,“他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

道格拉斯似乎从与父亲的“战斗”中尝到仇恨的滋味和报复的快感。王尔德此时已经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威胁正慢慢逼近自己,他曾对道格拉斯说过,他不愿意卷入他们父子之间的冲突,不愿意做他们彼此发泄仇恨的工具。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不愿被昆斯伯里侯爵纠缠,因为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名誉和地位,与昆斯伯里侯爵无论怎样斗争,最终自己都是得不偿失。但道格拉斯却始终斗志昂扬,恨使得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对王尔德保证,他和自己父亲之间的关系与王尔德无关,但他决不允许父亲对王尔德的私人友谊指手画脚,并保证不会将王尔德牵涉进去。

但事实上,王尔德又怎么可能不被卷进去呢?随着这对父子矛盾的加深,王尔德也是越陷越深了。

道格拉斯通过律师正式通知父亲:自己将拒绝昆斯伯里侯爵给自己提供的经济帮助。昆斯伯里侯爵显然非常伤心。1894年8月28日,昆斯伯里侯爵给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写了一封相当动情的信:“至于钱,你给我送来律师的信,说你一分钱也不要我的了,但无论如何,除非你改变了生活方式,我也不会给你一分钱;在你表现出这样的行为之后,我还认不认你这个儿子,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我想你是疯了,我很为你遗憾。”

事情走到这一步,王尔德显然也没料到,他后来在狱中以泪洗面时,对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做了这样的总结:

你的律师写给你父亲的信的结果,当然是逼着他走得更远。你使他除了继续下去别无选择,你迫使他面临着要么是保持名誉,要么是毁誉的两难选择。你的逼迫无疑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当他再次攻击我时,就不再以私人信件和你的私人朋友的身份了,而是在公开场合以一名普通人的身份进行了。我不得不把他从我的房子里撵出去。他一个餐馆又一个餐馆地寻找我,目的是想在整个世界面前侮辱我。他气势汹汹,大有如果我还击就把我消灭,即使我不还击,也要把我消灭的架势。

……在我与你的交往中,我从未见过你像在那个季节剩下的时间内那样情绪饱满高涨。你唯一感到失望的似乎是什么也没有真的发生,我与你父亲之间也没有发生进一步的遭遇和争执。你为了安慰自己,就不断给他送电报,这些电报的性质可想而知,因为最后那个可怜的人给你写信说,他已令他的仆人不许以任何借口再把任何电报——不管这些电报是如何伪装的——交给他。但这并没有吓住你,因为你看到公开的明信片给你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于是你就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对他进行了更多的追击。我并不认为他已真的放弃了这件事,他身上强烈的家族本能使他对你的恨与你对他的恨一样持久、强烈,我只是你们两人的工具、借口,既是你们的一种攻击方式,也是你们彼此躲避的方式。他对罪恶的热情不只是个人性的,而且也是家族性的。如果他对这件事的兴趣刚有一点点消退,你的信和电报就会很快又把他的兴趣刺激起来,使其回复到源于远古时期的热情。你的信和电报确实成功地起到了这种作用,你父亲自然也

就进一步与我较量下去。(《狱中记》)

应该说,对道格拉斯父子之间的争吵,王尔德当时最担心的是怕这些争吵干扰了他的写作计划。1894年5月,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去咨询了律师,想知道昆斯伯里侯爵信中关于自己和妻子的言论是否可以诉诸法律,或可以采取什么办法阻止昆斯伯里侯爵的激烈而侮辱性的行动。他与高级律师,经验丰富的犯罪学专家,后来成为他的法庭辩护人的查理·奥克塔维乌斯·休姆夫雷斯认真讨论了这件事。后来,道格拉斯的堂兄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荣誉,与王尔德达成协议,让昆斯伯里侯爵表示道歉,而王尔德则不再继续追究此事,由休姆夫雷斯写信给昆斯伯里侯爵要求他正式向王尔德道歉,7月13日,昆斯伯里侯爵回信拒绝任何道歉。

命运的安排总是无常——如果王尔德在向律师咨询的时候就对昆斯伯里侯爵的侮辱信件提起诉讼,而不是再等上将近12个月的话,很可能走进监狱的就是昆斯伯里侯爵而不是王尔德了。

事情的发展显然是越来越恶化,王尔德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他在给道格拉斯的一封信中说:

你父亲又暴跳如雷了,又到皇家饭店找我们去了,还发出威胁,等等。我认为自己现在最好把他捆起来才能使他安静下来。但那会多丢人现眼!被一个疯子追逐真让人难以忍受!(1894年7—8月)

1895年1月,结束了《诚实的重要性》的彩排之后,王尔德为了逃避昆斯伯里侯爵的追逐,带着道格拉斯到阿尔及尔旅行,但昆斯伯里侯爵并没放过他们,而是仍用威胁性的电报追逐着他们,王尔德在伦敦的朋友也警告王尔德要当心,但王尔德不知怎么当心,

他只能走下去。

实际上,这次旅行是一次错误的逃避,王尔德等于给昆斯伯里侯爵留下了足够的时间搜罗对王尔德不利的证据,如果他留在伦敦,采取断然的行动,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

昆斯伯里侯爵决定发动一次强大攻击。1895年2月14日,《诚实的重要性》首演,昆斯伯里侯爵密谋在首演之夜设法弄到一个座位,在演出中间向观众发表演说,侮辱剧本和演员,并在演出结束王尔德走到幕前时,向他扔垃圾。这显然是想通过作品来摧毁作者名誉的阴险诡计。但他得意忘形之下,在别人面前夸口说出了他的计划。王尔德得知后精心做了安排,通知了警察。当昆斯伯里侯爵带着他的拳击手来到圣詹姆斯剧场时,发现各个入口都有警察把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进不去,他在剧场外徘徊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才“像只大猴子”一样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在剧院门口给王尔德留下一把“奇形怪状的蔬菜花”。“当然,”王尔德后来对道格拉斯说,“这只使其行为更像个傻瓜——使其尊严荡尽。”

2月18日下午4点,昆斯伯里侯爵来到阿尔玛特俱乐部(王尔德为其会员),让看门人转交给王尔德一张卡片,上写“给表现为鸡奸者的奥斯卡·王尔德”,看门人在卡片上记下收到的时间,然后装进一只信封。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据王尔德后来说,他又失去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昆斯伯里侯爵留下明信片后的两星期内,王尔德和道格拉斯以及后者的一个朋友一起住在艾冯达勒旅馆,三人一起住了10天,花费甚巨。道格拉斯两人离开后,王尔德本希望到法国长期旅行,但因欠旅馆的房费,无法成行:

这就是我无法离开伦敦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欠旅

馆的钱,我在星期四早晨就会去巴黎了。在那个要命的星期五,如果我没有在休姆夫雷斯的办公室有气无力地承认我的毁灭,我现在可能正在法国过着幸福、自由的生活,也就能远远地离开你及你父亲了,也可以不必再理会他那令人讨厌的明信片,也可以对你的信漠然置之了。
(《狱中记》)

2月28日,王尔德来到这家俱乐部,看门人如约将卡片交给了他。读完卡片,王尔德立刻回到他和道格拉斯同住的一家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旅馆,随后给道格拉斯和另一位挚友罗斯写信,让他们抓紧时间来商议此事:

最亲爱的罗比(即罗伯特·罗斯),自我见到你后,又出现了新情况。波茜的父亲在我常去的俱乐部里留下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恶毒的话。现在我看只有对他进行刑事起诉。我的全部生活似乎都要毁在此人之手了。象牙之塔受到了邪恶的攻击。我的生活现在是立于沙丘之上了。我束手无策。如果你今晚11点30分能来这儿,请到我身边来吧。我利用了你的善意和爱,毁坏了你的生活。我已让波茜明天来了。(1895年2月28日)

当晚11点30分,罗斯赶到王尔德那儿。道格拉斯已在。罗斯建议王尔德立刻去见律师,由律师申请以诽谤罪逮捕昆斯伯里侯爵。第二天,三人一起去见休姆夫雷斯,后者听到最近发生的事也大感吃惊,他让王尔德发誓自己所说一切属实,王尔德发誓,这位律师说:“如果真是这样,你赢定了。”他答应申请逮捕昆斯伯里侯爵。

后来王尔德称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时刻”，而自己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则是因为“众人的辱骂、你（道格拉斯）的嘲笑的刺激”。

现在的另一问题是：王尔德已成负债之人，难以支付诉讼。“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最后的可怕时刻，为了可怜兮兮地抓住这最后可使我逃脱法律制裁的希望，我要花很大一笔钱。我当着你（道格拉斯）的面告诉律师我没有钱，我不可能支付那笔可怕的开支，因为我已没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钱。你知道我说的绝对是真话。”（《狱中记》）道格拉斯答应由自己的家庭提供所有必需的花费，这话王尔德当时也相信，因为对昆斯伯里家庭的每一个人来说，昆斯伯里侯爵一直都是一个妖魔，他每天都给妻子和其他家人造成数不清的烦恼和绝望，他们也经常议论着如果可能就把他送进疯人院，所以，现在王尔德控诉他，道格拉斯的家人也理应支持王尔德，“如果我能把他关进监狱，你们全家就会把我当作英雄和恩人”，虽然道格拉斯本人已经被父亲断绝了经济来源，但昆斯伯里夫人有不少富有的亲戚，道格拉斯肯定他们会非常乐意为此提供必要的开支。

听了道格拉斯的这番话，律师立刻开始着手办理此事，王尔德则急忙去了警察局。

王尔德开始筹钱，道格拉斯也如此。王尔德在此期间写信给一位朋友说：

你能帮我一个大忙吗？我要进行一次冗长可怕的审判，你能给我垫付500英镑的法庭费用吗？哈威克·道格拉斯勋爵已允诺为我支付一半的费用，昆斯伯里夫人已允诺支付“所需一切费用”，但现在道格拉斯在德文郡，昆斯伯里夫人在佛罗伦萨，而律师马上要用钱。

(1895年3月)

但实际上,王尔德信中提到的这些钱都没有兑现,道格拉斯辛苦一番也只借到360英镑:

当然,你的家庭并没有支付这笔钱,并且逼我破产的就是你父亲,是他逼得我拿出最后剩下的不足700英镑来偿付打官司花掉的钱。现在我妻子也疏远了我,主要是因为我每星期连维持生活的几英镑都拿不出,并且她正准备着离婚起诉。(《狱中记》)

3月1日,王尔德得到了昆斯伯里侯爵的逮捕证,3月3日,昆斯伯里侯爵被捕,并以诽谤罪被起诉。

侯爵被捕后先是被带到了维尼街警察局,然后转到大马尔波罗地方法院接受审判。查理·休姆夫雷斯在法庭陈述中解释了王尔德提起诉讼的原因,并传唤了阿尔玛特俱乐部的看门人西尼·怀特和执行逮捕的警察,听过证词之后,法官宣布案子推迟一周审理,侯爵取保候审。

第一次出庭为昆斯伯里侯爵辩护的律师是乔治·列文斯,他是王尔德家的常客,他显然不愿意再牵涉进这个案子,所以决定退出,昆斯伯里侯爵临时找到了爱德华·卡森。

卡森与王尔德曾是大学同学,虽然在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两人的关系都很一般,但与自己的同学打官司的确也不是让人愉快的事,另外他对打赢这场官司也没信心,王尔德的声望与地位,加上一直没找到确切的证据,都使他犹豫不决,直到律师事务所告诉他已经找到一个名叫查理·帕克的证人,可以证明王尔德与他曾在萨瓦旅馆发生过猥亵行为,他这才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3月9日上午11点30分,法院重新开庭,这次听证会座无虚席。王尔德在被告的两位儿子,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和哈威克·道格拉斯勋爵的陪同下乘马车到了法院。法官认出了阿弗雷德·道格拉斯,让他立刻离开法庭。

法庭上的王尔德犹如站在了演讲台上,法庭听众的拥挤显然进一步给他造成了这种感觉,炫耀的心情一下猛涨起来,这种作秀的诱惑后来证明对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是在老贝利法庭的时候。他的第一次回答就招致法官的责备:

休姆夫雷斯:你是剧作家和作家吗?

王尔德:(傲慢地)我相信我是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家。

法官:(严厉地)请只回答问题。

这次审讯最后以昆斯伯里侯爵再次取保候审结束,中央刑事法庭下次开庭期间再重新审理和判决本案。

此时距下次开庭时间实际上已不到三周了,对双方来说准备时间都不多。休姆夫雷斯决定请一个在各方面都堪与卡森媲美的著名律师为王尔德辩护,他最后想到了当时伦敦法庭的著名律师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克拉克显然有点儿犹豫,因为他以前从来没见过王尔德,而且除了知道王尔德是位著名的剧作家外,他对王尔德实际上一无所知。在接受之前,克拉克问休姆夫雷斯:“我能不能先见一见我的当事人?”第二天,休姆夫雷斯带着王尔德来见克拉克,双方简单地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克拉克对王尔德说:“王尔德先生,如果你能以英国绅士的名誉向我保证对你的指控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我才接这个案子。”王尔德马上站起来以自己的名誉严肃地保证说:“对我的指控绝对是错误的,没有任何根据。”王尔德庄重而严肃的誓言最终促使克拉克接下了这件案子。只不过后来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时刻做出的错误的决定。

与此同时,就在附近的律师事务所里,昆斯伯里侯爵的辩护律

师们也在积极准备反控王尔德。实际上,自成为被告以来,昆斯伯里侯爵就雇佣了私人侦探到处刺探王尔德的私人生活,寻找可以使王尔德名誉扫地的证据,而且小有收获。通过一个嫉恨王尔德的演员兼作家查理·布鲁克菲尔德——王尔德的剧本取得了成功使这位也可称为剧作家的人恨得咬牙切齿——无偿提供的线索,昆斯伯里侯爵雇佣的一个侦探找到了一位了解王尔德及其生活圈子的妓女,而这位妓女之所以愿意提供线索,则是因为王尔德及其圈子给她的生意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她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商业竞争。在侦探的逼问之下,这位妓女告诉侦探,只需去切尔西一位名叫泰勒的房子里去看一看,就什么都清楚了。这位侦探立刻赶往夏普尔街13号,推开看门人的阻拦,闯进泰勒的房子。果然,他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年轻男同性恋者的名字和地址,以及其他和王尔德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大鼓舞了被告的士气。

大战在即,王尔德本应留在伦敦,与律师合作,静心思考应战的策略,但道格拉斯坚持要去法国南部的蒙特卡洛,去享受一段大战前的自由呼吸,就像以前一样,对道格拉斯的要求王尔德总是无法拒绝,浑然不知监狱的阴影此时已经慢慢向他移动。两人离开了伦敦,来到了“一个会聚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丑恶的地方”。道格拉斯没日没夜地赌,只要卡西诺的门开着,他就从不停手,王尔德因为对赌博毫无兴趣,就孤零零地留在赌场外边。

你甚至不愿意用5分钟时间谈谈你和你父亲把我带进去的那种处境。我的使命只是为你付旅馆费,替你还清赌输的钱。哪怕我只是最轻微地暗示你我正面临着可怕的折磨,你也会感到厌烦。你对别人向我们推荐的一种新牌子的香槟更感兴趣。(《狱中记》)